



知行论坛

悟语荧屏话主流

□ 万俊人

在中国语言文化中,无论陈说还是立言都不止于单纯的语言本身,更关乎语言之外的许多因素,如:话语主体、语境和话语场域等等。日常生活世界的话语尚且如此,现代新闻传媒世界和文化世界——更不用说政治意识形态——的主流话语更是如此。何故?盖因“言”与“道”始终不可两分,一如道家所示,“言”即“道”,且“道可道,非常道”;二如儒家所示,“言”之有“道”,“文以载道”,“言以称道”;三如现代西方语言哲学家所示,语言总内涵涵词与语意、语用与语义之两分张力。职是之故,所谓陈说和立言者便绝非仅仅是嘴上功夫或笔下春秋,更多且更重要的是当为用心立言、以心达道。倘若再将说话者、语境、话语场域等因素考量在内,则话语之事大焉!因为作为话语主体的言者,不单身特殊生活世界,因之其言行必受其生活世界的外在约束,而且受其独特内心世界的知、情、意、信(仰)等诸多主体因素的影响,使其言行具有与众不同的话语方式和话语力量。在现代公共媒体传播中,甚至于话语主体的语音、语调、语势、语气等“话语技艺”都会产生难以预料的话语效应,因之所谓话语品质与话语技艺之间便有了千丝万缕的关联。

我们生活于其间的现代社会是一个日趋公共化的开放性社会,而其开放性又主要是通过社会结构(所谓制度化)、社会交往(所谓公共话语)和知识信息化(所谓知识信息的同质化和透明性)来表征的。具体地说,在现代公共社会里,我们的话语行为和话语方式需要遵循公共话语的规则,以公共交流和相互理解为基本目的。这并不是说,现代社会不再允许使用“私人语言”或“特殊话语”,而只是说,凡公共社会之话语交流必以话语者的相互理解和公共交流为基准。正因为如此,

话语方式和话语技艺的重要性才会日益凸显出来。古希腊人大概是较早意识到这一点的,他们较早开始公共场所(如广场)的公共演讲和对话、辩论,也较早创立了修辞学和逻辑学这样专门的公共话语技艺研究,甚至由此追溯到“言”与“道”的哲学理解,这与中国道家(和/辨)家产生了许多遥远而有趣的“思”“言”呼应。

话说到此,话语及其言说方式与技艺在当今公共社会中的重要意义大概不难理解。然而,今天的中国正处在现代化急剧转型过程之中,人们对于公共话语及其相关问题即使已有强烈的意识和感受(如,我们对于网络语言和公共传播话语的强力之感受),却似乎尚未形成对公共话语确定而共享的理解。国家和政府的权力部门同样也意识到了公共话语,尤其是具有公共影响力的主流话语的极端重要性,但似乎仍未形成健全而成熟的关于公共话语和主流话语的基本概念,更遑论有关主流话语的理论研究了。确乎,意识到某事之重要是一回事,理解并把握其本质要义却是另一回事。然则,意识的自觉意味着理解的开始。我想特别谈到的是央视著名节目主持人朱军的新著《朱军荧屏悟语》,我之格外关注它的理由主要有二:其一它是它开始了对现代电视传播中主流话语的深层次探究;其二这是这种探究并非出自新闻传媒学术界,而是出自电视媒体的节目主持人,也就是现代电视传媒实践一线的实际操作者。而这两个理由足以使我产生这样的判断:当今中国的传媒理论研究也呈现出理论落后于实践的窘境。就此而论,《朱军荧屏悟语》的出版便有了某种特殊重要的意义。

作者从主流传播媒体的主体角色主持人入手,依次探究了主持传播主体、主持传播环境、主持传播对象(受

众)、主持传播策略、主持传播与主流媒体、国家传播舞台上的创新传播等基本要义。毫无疑问,电视传播是当代媒体传播中的主角和中心,作为电视传播之主体的节目主持人理所当然便因此成为了这一主角的化身或者这一中心场域的聚焦点。不难理解,在某种意义上,主持人即是其所代表的传播媒体的代言人。代言人并非被操弄的木偶,而是有血有肉有情有义有思想自由言说者。即便“背景”和“环境”相似,同一传播舞台上不同的主持人仍然会有颇为不同的“表演”和“传播效果”。由此当可断言:节目主持人与其所代言的传播媒体之间的关系或互动其实是相当复杂的,这也是为什么有的主持人能够常青不老,而有的主持人却只能昙花一现。朱军的切身体会和深层研究告诉我们:主持人的话语力量和公共影响力不单取决于其所占据的传播媒体之大小高低,而且也内在地取决于主持人本身所选用的话语方式,尤其重要的是主持人的话语表达“技艺”,诸如:语言组织、言说风格、现场主持的操控能力等等。当然,节目制作者对现场传播环境的营造、传播者的传播策略设计等等也是直接或间接影响传播效应的极为重要的因素,而最重要的是节目主持人的效果,即受众的真实感受和“受”后的认可程度。

在很长时间里,人们对主流话语或多或少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误解:或将之化约为意识形态的宣传口号;或将之视为纯粹官方话语而刻意遮羞耳目;更有甚者,迷惑于时下商业大潮的冲击而误将时尚言词当成了社会主流话语。毋庸讳言,宣传口号或许被现代政治当作一种主流话语的速效表达,且在一些社会紧急状态下屡试不爽。可是,特殊情形下的宣传口号并非主流话语的普遍表达方式,

正常情形下的主流话语表达应当既具有对社会意识、观念的导引、感召之力,又有超拔并提振市俗流俗舆论和时尚言词之能,并能真正传达社会核心价值观念和社会正能量的“文化政治”力量,包括感召民众、动员社会、引领先行的话语能量。因此,主流话语的流动传播方式应当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相向互动,即:将国家政治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传播到社会大众,同时又从社会大众的日常生活之经验世界中吸取鲜活的思想文化资源,寻找主流话语的“词源”、“词根”和“词意”畅达沟通交流的语境暨语场,以便为主流话语传播开辟更广阔深厚的学术话语、文学艺术化的文艺话语和社会大众化的新闻传播话语;而其“自下而上”则需要把主流话语转化为社会大众的积极回应或主动反应,从而生成积极向上的社会文化风尚、虽差异互见却可能形成良性互动和较高共识的社会公共舆论,以及自由而良序的社会言论空间和对话场所,更重要的是,如此生成的社会文化风尚、公共舆论和自由言论,不仅能够对主流话语产生批评改进的能动作用,而且对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发挥积极的社会监督、批评和反省的思想力量。如此,则所谓主流话语及其充分表达才能真正实现其立言达道的目标。

很显然,在主流话语这一上下的互动流程中,媒体传播尤其是国家主流媒体传播的主持人,正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地位,既若大水之闸,还如通衢之桥,其作为主流话语代言者和传播者的人品、学养、能力和技艺实在是关系重大。(作者系中国伦理学会会长)

共同富裕是共产党人的使命

□ 黄艳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取得长足进步,贫困人口大幅减少,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升。但与此同时,不同地区之间、行业之间、部门之间、社会群体之间收入差距有逐渐拉大的趋势,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严重影响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实现共同富裕,让全体社会成员共享改革成果,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认真解决好的重大现实课题。

广大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的主体和基石。一个社会分配制度是否合理,不仅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而且关系到社会的长治久安。历史经验证明,两极分化、贫富悬殊是引发社会不稳定甚至社会动荡的重要原因。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能只看经济总量,也不能只看统计学上的人均数字,还要看贫困地区的变化,看低收入阶层的生活状况。要把社会财富的“蛋糕”做大,更要通过合理的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进而保证财富分配的公正性,调动社会大众的积极性和能动性。

共同富裕的基础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其目标也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要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

(作者单位:邢台学院)

认识与应对“汉字危机”

□ 沈祖春

全面梳理汉字字形、字义、字音的历史演变。从甲骨文阶段到现在,汉字演变的情况如何,哪些字是一直用的,哪些字是新增的,哪些字发生了讹变?这些问题至关重要。教育部可组织专家全面搜集整理甲骨、金文、简帛、石刻等出土文献用字,并结合传世字书,从书体和字形两方面,对每个汉字尤其是常用汉字的字形进行排谱,以呈现其具体的演变过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索字义,包括本义、引申义和假借义。确定本义是关键,本义和引申义之间的线索梳理也非常重要。已有的字典辞书,大都只罗列每个字的义项,极少分析从本义如何引申出其他的意义来。如果能将每个字的义项梳理清楚,那么学习者学习起来就会非常轻松,且使用起来也更加准确。字音与字形、字义密不可分,很多汉字的声符兼表意义,还有部分汉字彼此字形无关,但字音相同或相近,其意义也相关联。因此,全面梳理汉字音义的历史和关系,对学习汉字而言,至关重要。

加强汉字书写教育能否完全消解“汉字危机”

在电子时代,相当一部分人书写能力退化已是不争的事实。为应对这一危机,人们提出了诸多解决办法。这些方法大致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写”,具体分为两种,一是加强汉字传统书写教育,中小学应开设书法课;二是有人提出在电脑上写汉字。第二类是使用“形码”输入法。笔者以为,在电脑上写汉字和使用“形码”输入法均欠妥,原因在于,信息的传播讲求效率,而技术进步是提高效率最好的办法,假如汉字不能在电子时代实现计算机处理,那就存在淡出舞台的危险。因此,如果采用上述方式,则会对书籍的出版、报刊的发行以及人们的办公带来很大的影响。

由此,以上解决方案之中,应采取加强传统书写教育。教育部于2013年1月发布了《中小学书法教育指导纲要》,规定从当年春季开始,书法教育将纳入中小学教学体系,学生将分年龄、分阶段学习硬笔和毛笔书法。媒体也做出了积极配合,例如,湖南卫视播出《汉字英雄》,中央电视台推出《中国汉字听写大会》等,掀起了书写汉字的热潮。

加强传统书写教育的积极作用显而易见,它能够传承书法文化,消除使用输入法给人们的汉字记忆带来的负面影响,但也存在两点不足。其一,它并非解决人们对汉字“知其然”的最佳方案;其二,它难以解决“知其所以然”的问题。原因在于,加强汉字书写教育,只能机械地教学生识记汉字形体,而对于汉字字形与字义、字音之间的内在关联,以及汉字所承载的文化信息讲解甚少。那么,汉字的构件就变成了无意义的符号,学习者学习的时候就只能作机械记忆。这种汉字学习阶段的机械性将导致后来的提笔忘字、频写错别字。

可见,汉字书写退化只是“汉字危机”之表层,加强汉字书写教育只能治标。

如何应对汉字的深层危机

汉字的深层危机是汉字灵魂的丧失,即汉字的历史和文化被遮蔽了,人们在学习和使用汉字时,只知怎样写、怎样用,不知为什么这样写和用,汉字逐渐被驱壳化。什么以往,不仅会影响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而且会危及国家文化安全。笔者认为,为应对汉字的深层危机,必须从汉字的学习阶段入手,注重“知其所以然”的汉字教材的编写,分阶段加强汉字历史和汉字文化的教学。汉字教材应涵盖以下三方面内容:

对策建议

我国农村物流发展的问题与对策

□ 丁丽芳

相对于城市物流而言,农村物流是指为农村居民的生产、生活以及其他经济活动提供包装、加工、仓储、运输、装卸、搬运及其相关一切活动的总称。随着现代农业的发展,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农业生产大户和农村民营企业的不断涌现,农村物流的作用日益显现。农村物流作为联系城市和农村、连接生产和消费的纽带,已经成为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中一个新的增长点。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强调,要“完善农村物流服务体系,推进农产品现代流通综合示范区创建”。当前,我国农村物流虽然有了较大程度的发展,但是还存在基础设施、市场主体、服务平台、规范程度等方面的问题,需要进一步优化其发展路径,促进农村物流在农村深化改革中不断健康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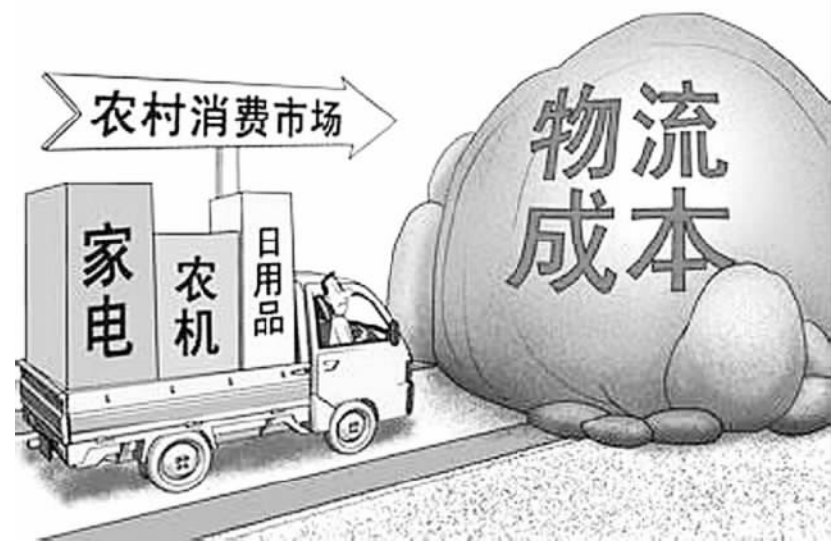
我国农村物流发展存在的问题

农村物流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包括包装、流通加工、运输、装卸搬运、信息处理等在内的每一项物流功能的具体实现,都有赖于物流的基础设施和物流技术水平。农产品的生产季节性、鲜活量多,不易储藏运输,这就对农村物流基础设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当前我国农村物流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缺乏物流资源集聚基地,运输组织固有所场较少,难以整合物流资源,不利于节约成本和提升效率,从而导致物流服务效率低下,服务水平不高。

农村物流市场主体不匹配。随着农村物流市场的深入发展,我国农村物流市场主体呈多元化、多层次发展趋势。在邮政企业、农业供销社等主要国有企业之外,个体、集体、私营、股份制以及外资等农业物流企业也快速发展起来。但从总体上看,当前农村物流市场主体与我国农村物流市场日益增长的需求还不匹配,还存在诸如组织网络不健全、规模比较小、市场覆盖面较窄等问题。

农村物流公共服务平台缺失。由于投入不足、重视不够,以及参与企业积极性不高、行业整体素质不高,我国现阶段农村物流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滞后,尚未建立具备数据交换、信息发布、智能配送、库存管理、决策分析等功能的综合性服务平台,造成物流信息不能共享,通过信息化手段提升农村物流运作水平的能力较低。

农村物流服务规范化程度低。对于物流企业来说,规范化是提高内部



资料图片

管理、降低成本、提高服务质量的有效措施;对于消费者而言,享受规范化的物流服务是消费者权益的体现。我国近年来也认识到农村物流服务规范化发展的重要性,但总体来说,我国农村物流服务规范化程度比较低,缺乏农村物流服务相应的行业规范和标准。

促进我国农村物流发展的建议

完善农村交通物流网络。县(市)构建物流分拨中心作为农村物流的集散中枢,在乡镇利用邮政、供销社等网点建设乡镇物流站作为农村物流的中间层节点,在较大行政村、供销社超市、农资超市、农村集市等设物流网点作为农村物流的基层末梢。通过构建县(市)、乡、村三级农村物流网络节点,有效提高农村物流网络连通度和覆盖面。

加快培育农村物流市场主体。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发展农村物流,鼓励有条件的农村专业合作社和农产品储运企业开展联合或合作,促进农村物流领域第三方物流企业的发展,提高市场在农村物流领域的资源优化配置